

序跋精粹

和雪花一起漂流

张宪光

1. 有雨的日子，宜读书。这几
天寒雨潇潇，落落停停，却读不进去。独自坐在灯下，听着雨声，仿佛回到了住在溪边的日子。

江南的雨，似乎总是飘飘洒洒，慢声细语。有龙卷风的那几天，完全改了性子，几乎要把树连根拔掉。这样的豪雨狂风，不多见。时光似乎也是如此，有时慢悠悠的，有时锣鼓铿锵，急弦繁管。那种紧迫，就像一个诗人所说：

四十岁到六十岁
这中间有二十年不知去向。
这话有点夸张，“一觉醒来已经抵达/华灯初上，而主客俱老”的感觉，倒是真真切切的，惊心、怅惘兼而有之。

2. 住在溪边的日子，就像急弦
繁管了一阵子，然后停了下来。忽然之间，很重的东西落到水面上，掀起了巨响，然后慢慢归于平静。这个时候，一尾离开了水的鱼，需要重新回到水里，重新找到自己的河流。独自听着晨鸟的雀跃，独自听着清脆或沉闷的雨声，独自听着窗外蟋蟀的哀鸣，独自观水听风，独自看着夕晖沉没，独自登上天马山……万物静默如谜，涵泳其中，与之交流——忽然之间，发现了那个园子的诸般好处，仿佛无意中发现了自己的河流。

我住的那个园子，离陆机兄弟的华亭谷不远，离醉白池也不远。古华亭本是鹤与鹿的家园，可惜鹿鸣，鹤唳已经听不到了。幸运的是，在那些日子里读到了《一平方英寸的寂静》。此书不仅仅追随约翰·缪尔等人的荒野传统，某种程度上与《达摩流浪者》等书也有一些关联，读了它才真正认识到了寂静离我们有多远。我天真地想成为一名自然声响录音师，置身荒野，倾听最细微的天籁。那本书里有一段话，我很喜欢：“那一晚月光很亮，映照四周的静谧，感觉就像在聆听一千年前的居民在同一地点听到的声音。他们或许没听过怪柳婆娑的音韵，但肯定听过柳树和三叶杨，还有那些动物的声音。对我来说，那种经验令人震撼，因为我听到的声音跟以前居住在这里的人听到的声音一样，……”是的，住在溪边的日子里，我听到的也许仍是一千七百年前陆机兄弟听到的声音，也是《诗经》中的诗人听到的声音，通过声音我遇见了他们，而“声音改变了我的意识”和谛听的方式，——“那一刻的感动就像岩石画或象形文字一样，刻画在我的意识里”。我尝试用文字记录这些声音，记录那些时刻，重新审视自己关于大地的经验，重新估量诗与生活、自然、历史之间的关系。

于是一边倾听，一边观看，一边读，一边写。

3. 那年的白露，和友人一起去
唱歌，晚上回到那间河边的小屋，疲惫已极，洗了澡便睡下了。除了草丛深处的虫声，万籁俱寂。我的这个小园子，算得上一个微型荒野，除了那

个晾衣架和木质桌椅，一切都按照自然的秩序在生长。有时候，把小路上的一些杂草拔掉，才算是略微改变了一点荒野的面貌。

第二天早上十点半，坐在书桌边准备看书，雨便下起来了。沙沙的雨声，真是好听，打在废弃的钢窗上，发出滴滴答答清脆的声响，就像没有节奏的乐音，随意，恬静，悦耳。狗尾草的穗子现在更饱满满了，低低地弯下来，在雨中静默着。它们已准备好了种子，随时将它们传送到远方。它们是野蛮、骄傲而优雅的，在枯黄前尽情地展现自己的翠绿，没有虫声里渐渐增加的焦灼。杂草还零星地开着些小黄花，花上面依然翻飞着菜粉蝶。

十二点三刻，我正坐在窗前写一段笔记，不远处的树上传来了寒蝉的嘶鸣，我的心里忽地泛起一阵喜悦。古人认为，一到白露时节，蝉便不再鸣叫了，其实不然。一声落下，一声又起，只是确实没有上周的叫声那样强劲，收束的时候也有些狼狈。寒蝉唱罢，一只黄中带红的蝴蝶停在那棵细细的桑树上，就像一朵静谧之花。我正看着它，寒蝉的声音又响起来了。那只蝴蝶似乎受了惊，飞起来，环转了一下，落在另一片桑叶上。原来那是一只蝴蝶，它们停下来，又飞起来，在草丛中间欢快地飞着。

下午三点十五分，一只蝉又叫了起来，比上一次还要短暂，但紧接着又开始了嘶鸣。那声音里夹杂着些颓唐、倦怠的东西，也许是刚下过雨的缘故吧。即便白天，蟋蟀依然会倔强地鸣叫。它们似乎不太关心什么时候鸣叫更高效，全天候地发出自己的信息。

窗外，狗尾草长了一园子。门口也

是。《古诗十九首》其一云：“明月皎夜光，促织鸣东壁。玉衡指孟冬，众星何历历。白露沾野草，时节忽复易。秋蝉鸣树间，玄鸟逝安适。”读之令人泪下。这便是平常的一天。

4. 在阿尔克马尔的一个医院里，
日本艺术家川俣正开展过一个艺术项目，造了一座木桥，名为“工作进程”。这座桥由艺术家与患者共同建造，过一段时间就要延伸一次，不断地处于更新中，仿佛可以感受到地平线彼端海的气息。这是一条多方向的、让医院的病人象征性地重回社会的隐喻之路，听觉、视觉、嗅觉、触觉本身被激发出来，成为景观的一部分。步道的高低起伏，改变着人们看的视点，木头的声音让人们感知到新的声响。

偶然看到这件作品的图片，让我对读与写有了新的思考。每一本书，都是一条这样的通道，让读者看见那些未曾看见的风景，关于自然、社会、心灵、自我、历史等等。每一条通道，都留存着作者观看的方式，显现着眼睛的历史性。因此，阅读是一次观看，一次体验，一次感觉，一次参与，一次搭建桥梁的行动，一次“自私”的发现。每一条通道，都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建造的，作者敞开了可能性，读者参与进来，丰富、充实了这种可能性。写与读，便是与世界建立关联，接收并传递来自“前方”的信，建立一条可能的逃逸线，——这是读与写的归依之处。回头看自己的写作，自然很不满意，甚至是失望的。以后不会再写那些考据性的东西了，也许它们增添了一点儿对于古人的了解，然而对于踏实

的生活实是可有可无的，或者说，那只是一种不良的写作趣味的结果。知识很重要，能带来愉悦或解答，沉醉其中则是一种自欺。对每个渴望自我认知的人来说，启迪高于知识，只有找到属于自己的通道，浸润在生活的河水里，才能略略接近那看不见的风景。

——读与写，是存在的方式，是寻找逃逸线的方法。

5. 收在这本书里的几十篇小
文，要算是从逝水中抢救出的证据。过去的十几年，读书没有什么计划，写东西凭兴致，乱七八糟的东西写了不少。回头看看这些文字，未尝不浸透了一些生命的欣喜，有价值的却不多，更不能确信对他人有益。作为“证据”，成色不足。不过，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悲欣，不期待大悲大喜，也没有强烈喷发与风生水起的欲望。倘若说有点自己的追求，便是平淡些，再平淡些，却又每每因清浅而缺少回味了。

保罗·策兰的诗里说：
你改变钥匙，你改变词语，
和雪花一起漂流。
什么雪球会聚拢词语
取决于回绝你的风。
那回绝你的风，是生活的恩赐，让你和雪花——词语一起漂流，一起进入一种边缘的状态。在边缘中寻找词语，是一条孤独的路，也许要不得不沿着它走下去。我影影绰绰地看到了那无法言说的“雪”。

(本文为作者《住在溪边》一书自序，该书即将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)

笔会



花季雨季
(水彩·粉画)
向园



读初中的时候，我忽然迷上了申胡，很用心地练过两年。

同班同学的哥哥是一个小儿麻痹症患者，依靠拐杖支撑瘸腿，行走十分不便，无奈当了钟表匠，每天将放大镜嵌在眼眶里，埋头修理手表，却还狂热地喜爱艺术，吹拉弹唱样样精通。当他把瘸腿搁起，眯着眼睛悠然拉响申胡，仿佛全部的灵性都飞向了另一个天地。他还有一个小弟，擅长演奏扬琴，于是吸引不少同道，一有空就带上乐器聚集在他家客厅里，拉琴，唱歌。我的琴很破旧，弦线易断，鳞片松散，但我仍然努力跟上节奏，乐此不疲。

后来，我和几个同学下乡插队落户。一度，大队里让我去“戴帽子小学”（编者注：指小学增设初中班）当民办教师，教数学、英语和音乐。我并不擅长唱歌，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阵。村校没有脚踏风琴，我就拉起胡琴伴奏，居然也能让孩子们接受。

申胡，是一种专门为申曲伴奏的胡琴。跟京胡、板胡、坠胡不同，它似乎没有北方乐器那种高亢响亮的粗犷、穿透人心的激越，而是柔美中蕴含明丽、纤徐中透见雍容。而且一旦加快节奏，那喷薄而出的力量也足以令人感染。不管在哪里，只要申胡一响，听者的心顿时被吊起来了。申曲其实是沪剧的前身。沪剧舞台上常演不衰的《雷雨》《阿必大回娘家》《碧落黄泉》《庵堂相会》，都是家喻户晓的申曲文明戏。只要台上琴声一响，观众就知道唱的是麒子板，

申胡响起

陈益

还是紫竹调，随即跟着哼了起来。行走在乡下田埂，随便哪个角落都可能冒出几句“春二三月草青青，百花开放鸟齐鸣。……萝卜花开白似银，蚕豆花开黑良心”，这是真正的引吭高歌呢。

记得十一岁那年，我曾跟着祖母，在叔叔工作的青浦沈巷住了半年，并且借读。读书的过程完全不记得了，留下印象的唯一一件事，就是看电视。我有机会在公社会议室看到了电视里播放的沪剧。屏幕是黑白的，不时出现雪花闪烁，要调节蜻蜓式天线的竹竿，才能稳定下来。然而，我终究作为电视最早的观众之一，在这个市河流水随潮汐涨落的乡镇见识了沪剧，见识了在日本纱厂当包身工的珍珠和她的母亲杨桂英，还有那个凶神恶煞的“那摩温”。少不更事的我，被杨桂英的那一长段饱含控诉血泪的赋子板深深打动，竟忍不住抹起眼泪。我不知道一个人的记忆在脑海里能保存多久，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力，但从那时候起，被沪剧的魅力所俘虏，已不言而喻。后来迷上申胡，傻傻地练习，也是出自情不自禁的喜悦。

自然，我根本没有天赋，无法成为琴师，以操申胡为业，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与沪剧的缘分。后来进文化部门工作，一度曾分管演出，常与剧团打交道，与演员交朋友，不时有机会观看沪剧演出。去年，我参与“非遗”项目的评审。位于淀山湖畔的淀山湖镇也将沪剧列入申报名录。他们不仅创作、编排剧目，还组建剧团，邀请沪上名家指导，先后演出了大小沪剧一百多部。四乡八村，老老少少喜欢沪剧，一代又一代人成为沪剧迷。我当然毫不犹豫地投了赞成票。

与昆曲相比，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沪剧是后起之秀。昆曲脚本，不外是元明清时期的生活写照，沪剧也有一些晚清、民国的传统戏，但更多的是新写的现代戏。唱词通俗易懂，曲调耳熟能详，舞台朴实亲民。所选择的题材，甚至可以是外国戏中国化，比如由莎士比亚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改编的《铁汉娇娃》，由普契尼原著改编的《蝴蝶夫人》，由美国电影改编的《魂断蓝桥》。国际化大都市的多元文化由此显现。那

些身穿长衫马褂、对襟袄，或者西装革履、衣褶时髦的演员，在申胡领衔的丝竹伴奏下唱得中气十足。他们的沪语对白和唱腔，流露些许浦东口音，不时冒出的几句乡谚俚语，令人感到分外亲切。那演绎的故事，悲欢离合，人情冷暖，哪怕是彼此之间的挖苦、讥讽、逗趣、调侃，也不是一直发生在戏迷身边的，丝毫也不陌生。

从前的水乡乡镇，很少有剧场。每逢演戏的日子，主办演戏的东家往往用桅杆、平基板、跳板和桌凳在庙前广场搭建戏台，年轻人尤其起劲，常常天不亮就动手了，白色的篷帆就是台侧幕布。后来渐渐出现移动式戏台，台座、望柱、屏风墙、木踏步是可以拆卸的。戏班子携带这些构件，用大船运到各处，再根据寺庙、宗祠的条件巧妙搭建。尽管场地简陋，看戏却是当时的一件盛事，人们会扶老携幼，摇船动棹，从四面八方赶来，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。第二天早晨清扫场地，会捡到一摞烂单只的鞋子……如此情景，今天或许只是那些不停地刷抖音，独自倾听了是娥、杨飞飞、邵滨孙演唱视频的资深戏迷，才有真切体味吧。

我们小区围墙外有一条滨江甬道，每到傍晚，总是有很多人结伴快走、慢跑。有个看上去去年逾七旬的老人，总是拎着一只老式的收录机，边走边听。我时常在经过他身边时，听到耳熟能详的申曲伴奏，就如一阵和风拂面。他眉眼中溢出的满足感，仿佛一个老饕如愿以偿，我也像被分享了美味佳肴……



张薇

卞之琳先生与浦东之缘

卞之琳先生曾在上海浦东中学求学。可遗憾的是网上搜一下关于浦东中学的校史介绍，著名校友中提到胡也频等文人，没有提到卞之琳，笔者姑且补漏。

卞之琳在江苏海门中学读初中，遇学潮，转学至启秀初级中学、三益中学，在懵懂少年时期，他早早地接触到新文学，国文老师杨宗时介绍了鲁迅的《呐喊》，卞之琳购到《志摩的诗》初版线装本，他后来在《徐志摩诗重读志感》中说：“这在我读新诗的经历中，是介于《女神》和《死水》之间的一大振奋。”初三时英文课本就选有《莎士比亚故事集》，这些都是他的文学启蒙。他可谓少年诗人，初中二年级时写的几首小诗就被收入上海出版的《学生文艺丛刊》。

1927年夏，卞之琳坐船从海门渡江来到上海很有名气的私立浦东中学，该校由一代营造业宗师杨斯盛在清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捐资兴办。杨盛清是一位很有眼光和胸怀的民族企业家，懂得教育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意义。这所学校成了浦东地区的第一所中学，是近代上海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完全中学，有“北南开，南浦东”的美誉。该校聘请的老师都由校长严格挑选，包括外籍教师。我在卞之琳先生的外甥施祖辉老师家曾看到一本校友录，只有巴掌大，封面已失落，纸页发黄，但里面的字和图像清晰可见。翻开是教务主任李石生题字“浦东中学第十一届高六级级友录”，然后是目录，包含“序”、“本级职员”、“本刊职员”、“校主遗像”、“程故校长遗像”、“张代理校长像”、“李教务主任像”、“本级级友全体摄影”、“本级级友参团摄影”、“级友”、“教职员通讯录”、“本级级友通讯录”。校友录上面清晰地印着“校主杨公斯盛遗像”。接下来是“本级职员”目录，正级长周怀瑾君，副级长杨祖绳君，等等，每个人的名字后都加“君”字，以示尊敬。再下面就是学生名单，从级友通讯录和照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他们这一级总共43人，排列顺序有说明，“级友姓名先后系依照王云五先生发明之四角号码排列”，这样排下来，卞之琳排第三。学生来自五湖四海，“序”中有交代，“本级同仁，负笈来自四方：北自长白之东，南极琼州之南。数千里外，萍水相逢；聚首一堂，识荆恨晚。方期朝夕磋磨，共作他山之助；奈何白驹易逝，刹那又赋别离。‘相见时难别亦难’，有令人不胜悲感者。从此骀歌一曲，男儿歌志四方；阳关三叠，后会难期何日。爰是有级友录之刊焉；集同仁之小影，而各为之传，毋谦，毋夸，俾得真‘真’。他日攀荆倾盖，展卷言欢，当添无穷乐趣；即闲来披阅，亦可减去不少离愁。未附通讯录，用作鱼雁传递之助。是同仁虽别，而精神常聚也。”序的落款是“新安石声金昌”，这本小册子相当于今天的毕业纪念册。第15页上印有卞之琳的肖像以及他的英文名字 Chih-lin Pien，那时没有汉语拼音，自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按照拼音来写英文名，这个英文名一直沿用到他终身。然后是卞之琳的“自志”，即自述，“之琳，现籍江苏海门，卒业于三益初中后，来浦投考忽忽两载”（上图）。之所以写“忽忽两载”，是因为该校高中学制三年，他人入学时插入高一下学期，1929年夏又提前半年毕业，实际读高中两年。学校分文科班和理科班，卞之琳读的是文科班。学校实行学分制，高中习满150分为毕业。凡提前习满毕业学分者，即可提前毕业。可见，卞之琳聪慧过人，提前完成了学业。

当时的浦东中学除国文外全用英文课本，也有外籍教师讲授，严格的英语教学为他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。卞之琳选修了莎士比亚戏剧课，读了原版的《威尼斯商人》，这是他的莎士比亚启蒙教育。而这种后来发芽成林却导致我对西方文学的关注”。当时父母像江南乡镇破落地人的想法一样，希望他学点洋文，以便到邮务、海关等洋人把持的机构里谋事。带着母亲望子成龙的希望，怀揣着对京城、对北大的憧憬，卞之琳暂时结束了与浦东之缘，乘火车离开上海，前往北平，翻开了他人一生中辉煌的一页。虽然在浦东的时间并不算长，但这两年的经历无论从文学创作、涉学初猎，还是革命思想的启蒙，都是他事业的起始点。

后来卞之琳多次途经上海，或从上海北上，或从上海出国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，或在上海参加农业合作社的试点工作，或回乡省亲，上海成了他人生重要的驿站，是获得精神再出发的加油站。

在浦东中学，卞之琳贪婪地阅读